

杜國序文集



序《杜国庠文集》

郭沫若

杜国庠同志，我們一般称他为杜老，他素来很健康，不料过了七十岁还得到胃癌而竟致不治。

我是一月尾上在昆明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才从古巴訪問回国。二月二日，我做了两首诗来弔他。

（其一） 铁窗当日着南冠，松柏后凋閱岁寒。
早赋壮怀常落落，晚成大器自瞿瞿。
东游共席推心腹，西狩同舟瀝胆肝。
尽翳成風臣善斲，郢人不作撫斤叹。

（其二） 生死交游五十年，老兄風格胜前賢。
墨名絕学劳針指，馬列真詮費火傳。
夜雨巴山窗尚在，風云潮汕榻尝联。
便桥一集成千古，手把紅棉讀逸篇。

国庠同志是比较早期的日本留学生，他比我还要早几年。当一九一四年夏季我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預科的时候，

他已經是該校的本科三年生。本科三年畢業，就快要進大學了。

他的志願是研究經濟學，但他對於哲學很感興趣。當時有一位佛學大師桂馨谷先生在東京本鄉講《大乘起信論》，我和他一同聽過講。因此，我和杜老的班次儘管相隔頗遠，但我們也有這樣的机会，相互接近。

杜老在當時的態度，我覺得有點落落寡合。他平時既不輕易言笑，也不輕易結交朋友。但他是很和易的一個人，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對誰動過聲色。

杜老的专业是經濟學，因此，他接觸馬克思主義比較早。記得是一九二四年，上海的孤軍社曾經討論過中國的經濟路綫問題。由於該社社員多是日本留學生的關係，也曾經分別向杜老和我征文。結果，只有他和我主張實行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其他的人都和我們相反。那些人（其中包括叛徒周佛海）和醒獅派相呼應，成為了國家主義的別動隊。這件事情給杜老的印象很深。在一九二六年，我們經過多年闊別，在廣州重逢的時候，他很高興地向我說：“我們是志同道合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

一九二六年是“大革命”發動的一年。那年三月我擔任了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職務，由上海到了廣州。杜老那時是潮州中學的校長，四、五月之交他到省城來參加過教育會議，我們的久別重逢就是在那個時候。不久北伐軍事發動了，我又參加了政治部的工作，隨軍出發。在爾後一年中，中國的革命運動起了很大的變化。

經過了一九二七年八一起義，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了中國革命。我們從南昌出發，一直打到了汕頭，想把工农運動的基礎比較鞏固的廣東作為革命的根據地。在汕頭，我又和已經潛伏

在地下的杜老見面了。这是在不少同志遭到牺牲之后的見面，我們的情誼是不同尋常的。駐在汕头的几天，杜老是和我在一道的，晚上并且同睡在一个鋪位上。詩中的“風云潮汕楊棠联”，說的就是这件事。

汕头失敗之后，我們又分散了。这一分別又是十年。我在芦沟桥事变后由日本潛逃回国，举国人民所渴望的抗日战争終于发动了。在上海时，有些国民党的將領感受着軍隊中沒有政治工作有很大的不方便，便以私人关系，通过我替他們組織一些政治工作大队或者政治工作队。这是后来国民党正式恢复政治部的先声。

首先組織的是在浦东方面的政工大队，由錢介磐（亦石）同志当队长。当时杜国庠同志剛从獄中出来，便参加了这个大队。不久錢介磐同志因病去世，杜老便代替了介磐同志的职务。

国民党正式恢复政治部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那时已进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阶段，由周恩来同志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之一，而由我担任第三厅厅长，主持宣傳工作。第三厅是四月一日才正式成立的，厅之下有三个处，处之下有三个科。我們請杜老来担任了对外宣傳处第一科的科长。

当时的第三厅集中了不少的进步知識分子，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我們只能宣傳，不能組織。組織工作是由以康澤为厅长的第二厅所主管，我們的工作剛好被他对消。而且所謂宣傳工作也很不自由，国民党从經濟上来限制我們，第三厅自成立以后一直沒有固定的經費。因此，就在武汉要撤守之前，我們已經是什么工作也不能做了。

杜老是很有耐心的人。他适宜于做內部工作，工作作風很

細致，很謹慎。因此第三廳的內部工作，特別是應付國民黨的工作，差不多主要是杜老在擔任。在武漢撤守之前，他曾率領過很大一部分人員的分遣隊到衡山同政治部本部一道工作。其後遷到重慶，分城鄉兩地辦公，鄉下的一部分人比城里多，也是由杜老率領的。詩中的“西狩同舟瀝膽肝”，說的也就是這些。

國民黨反動派在一九三九年整個地遷到重慶之後，更露骨地執行着它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第三廳便更加成為了他們的眼中釘。起初他們要求大家加入國民黨，結果除掉少數司書和一兩位比較高級的投機分子之外，誰也沒有接受這個要求。後來他們就大規模改組第三廳，凡不願入國民黨的人都必須退出。但又怕退出來的人都跑到延安去了，因而又來了一個羈縻的辦法，叫作“離廳不離部”。他們要我把退出第三廳的人組織為“文化工作委員會”，由政治部管轄，但不在編制之內。這個委員會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能從事對外的政治活動。

實際上國民黨是把算盤打錯了。它以為這樣就限死了我們，其實倒更便宜了我們。我們倒利用了這個組織，老老實實地做了不少的研究和寫作工作。拿我自己來說吧，我的《青銅時代》的絕大部分、《十批判書》的全部和《沸羹集》、《天地玄黃》中的絕大部分雜文，都是這時候寫成的。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以及《棠棣之花》的定稿，也都是這時候寫成的。我的寫作活動恐怕要以這個時期最為活躍。

再就杜老來說，他也踏踏實實地利用了這個時期來進行研究。他的墨家邏輯的研究、名家公孫龍子的研究，據我所知道的，都是完成於這個時期。詩中的“墨名絕學勞針指”，便指的是這一段工作了。當然，在這之外，杜老也還做出了好些文筆上的

成績，像批判胡适和批判前期馮友兰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杜老和我的确如他所說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我們在学术見解上有时也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他对于墨家便比較傾向于全面肯定，而我則是從發展与时代关系上批判地有所取舍。对于这个問題，有时候我和他爭論得相当厉害。詩中的“尽翳成風臣善斲”，就是說我对于他的不客气。我的大刀闊斧式的作風，我自己也知道，恐怕只有杜老才受得了。但我正因此而尊敬他，而爱他，我無論在做人 and 做學問上实际受了他的教益不少。

順便再說一点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其他作用。尽管国民党反动派想限制我們，不准我們做对外的政治活动，其实在日寇投降前的一段时期內，对重庆的民主运动，文化工作委員會是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的。单是城內的办公地点天官府街七号就成为民主人士召开座談会的集中場所。因为究竟是个机关办公地点，特务小喽囉們不敢擅自进来捣乱。还有，在当时盛极一时的戏剧活动，通过戏剧的表演来进行宣傳和批判，也主要是由文化工作委員會来进行組織的。那时的戏剧活动，在政治宣傳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国民党反动派也并不是完全盲目无睹，所以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們忍耐不住，便索性把文化工作委員會解散了。

在三厅时期和文化工作委員會时期，我們曾經做过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上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那一段时期的生活頗值得我們回忆。解放后我曾經有好几次到过重庆，并去凭吊过以前的城乡两地的办公地点，像城內的天官府街七号和乡下的賴家桥全家院子（院內有一株大白果树），都还存在。这就是詩中所說的“夜雨巴山窗尚在”了。但我知道，杜老在解

放后却不曾去过重庆,而在今后更无去的可能了。

《便桥集》是杜老去世前不久自己編定的一个哲学論文集,卷后附有《紅棉屋札存》。他去年曾經送我一册。我讀他的书是特別感觉着津津有味的,因为除理性的享受之外还給予我以同生死、共患难的一大段生活上的回味。現在同志們把杜老的著作尽可能全面地蒐集了起来編輯成集,我想杜老如尚健在,他总不会再客气地命名为“便桥”了。然而,杜老也是有自信的。因为他是党的优秀的儿子,所以他能起桥梁作用。只要是桥,便会引导我們,这可毫無疑問。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于从化溫泉。

杜國庠文集序

侯外廬

当敬爱的杜老逝世的一周年，我讀了广州“杜国庠文集編輯小組”同志們編輯的《杜国庠文集》，倍觉他的精粹的遺篇逸章是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結合的典范，教育意义很大。讀者可以看出，《杜国庠文集》的五部分，包涵着中国哲学思潮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关键性的問題，同时更貫串着通过对哲学史的总结而展开理論斗争的精神。

我和杜老，从开始通信商量翻譯經典著作，以至我們在一道从事学术的組織工作，共同編輯《中国学术》季刊、《新思想》等几个刊物和編写《中国思想通史》，已有卅余年的历史。正如郭老所述的，“我們是志同道合的”，但我和他更是师友之交，我受到他的教益很多。他的忠厚长者的优良品质，他的不計較个人利害得失以及生活严肃、簡朴、謙虛的作風，他的学习中精益求精的自我批判精神，他的“有条不紊”（郭沫若同志的贊語）的治学方法，他的对青年循循善誘的态度，特别是他在革命工作困难的

日子里所表现的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不放松任何机会和敌人斗争的坚强有力的战斗意志，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了解杜国庠同志比较深的是他在文化战线上有的放矢的战斗精神和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成果，因此，我想从《杜国庠文集》中所表现出的这两方面概述一下他的优异成绩。

杜国庠同志始终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积极的战士。从1928年他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时期起，就针对反动理论从事无情的批判，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整理并研究中国文化遗产，即使是用简短札记的体裁写的文章，也是有的放矢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学者们，配合蒋介石的几次反共高潮和对日投降政策，企图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放出了各色各样的反动理论，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纲领，什么“复兴礼学”的复古主义，什么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战国策派”，什么宣传卢卡奇的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胡风派等等，杜国庠同志对这些反动理论几乎无不痛予批驳。他在一篇《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的论文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中国古代礼乐的起源、发展以及将来新时代礼乐的前途之后，批判了国民党反动官方的《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先锋》等刊物的反动说教，指斥这一小撮文化匪徒是封建思想的复古主义，是为蒋介石没落王朝“制礼作乐”的专制主义，是如叔孙通之替汉高祖制礼而贡献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残酷工具，是一种奇谈怪说的“民族宗教”！在这篇文章中，杜国庠同志指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礼乐“其本身实随着时代而发

展，……是适应于奴隶社会后半期到封建社会建立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東西”，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預言：“我們相信，只要使民众获得充分的民主自由，获得丰衣足食的机会，获得接近世界前进的新文化（按指馬克思主义和毛澤东思想）——尤其新的科学和文艺，获得批判接受中国过去文化的方法和時間，那末，……一定会有优美的礼节和音乐产生出来。”杜国庠同志对准了那些反动派的御用“理論家”責斥道：“不加批判地提倡什么‘礼学’，那必然要做古人的俘虏，而根据那些‘礼节’来鼓吹‘制礼作乐’，也必然开倒車，硬拉中国走上复古的道路。”他最后指出这般人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犯了滔天的“罪恶”！

在抗日戰爭的末期，胡風的《七月》发表了《論主观》一篇所謂哲学的文章。当时因为我們还没有摸清胡風反动派的底，只有从理論上予以批判，而且发表文章也很困难。杜国庠同志和馮乃超同志組織了一次报告会，指定我发言，事先杜国庠同志同我談到的意見非常有見地，他說“必須把《論主观》一文和胡風的編輯前記联系在一起予以痛击。胡風这人詭計多端，阴阳两面，我看《論主观》一文虽是別人执笔的，但內容全是胡風的反动唯心主义。他的假馬克思主义的外衣，很可以欺騙一些青年，危害甚大。你不要拘泥胡風本人在座，必須公开毫不留情地痛加駁斥。我看胡風不敢反噬，如果他真要反扑，我們一起和他斗争。”解放后，胡風反动的政治面目露了原形时，回忆杜国庠同志的教言，实在珍贵！

在抗日戰爭时期，杜国庠同志还对馮友兰先生的著作《新理学》、《新原道》、《新原人》等宣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辯論。当时馮先生的学說很迷惑一些人。例如在杜国庠同志和我参加

的一次讀書會上，張申府就胡說：“中國文化，要孔子、羅素和馬克思三位一體結合起來。《新理學》已經是有代表性的傑作！”杜國庠同志聽了這種謬論，大笑起來。他在會後對我說：“我們應該批判‘新理學’。我想，我們可以用商榷的態度和馮先生進行辯論。”他帶頭寫了三篇文章，即收在《便橋集》里的三篇。其中《玄虛不是中國哲學的精神》是批判《新原道》的，《玄虛不是人生的道路》是批判《新原人》和《新原道》的，《論理學的終結》一文是從歷史來批判《新理學》開倒車的。《評馮友蘭的新形上學》是總括前三篇的論旨發揮的，登在《中國學術》季刊創刊號。現在都編入《文集》的第三部分。杜國庠同志對我這樣說過：“新理學者玩弄古董走到那里，我不得不跟他那里，予豈為古典而古典研究哉？予不得已也！”

杜國庠同志寫的幾篇批判文章，當時曾經設法轉給馮友蘭先生，帶有商量的意思。馮先生雖然當時沒有接受批判的意見，還寫了《新知言》，間接地有所爭辯，但從解放以來馮先生所寫的幾篇自我批判文章來看，杜國庠同志的批判對馮先生是有幫助的。

杜國庠同志寫批判“新理學”的論文在當時是很有分寸的，但是很有說服力。他在當時限于環境，只集中在這樣兩個方面展開論點：一方面，說明唯物主義才是中國哲學發展的優良傳統，揭露“新理學”自居于“接着”幾個唯心主義的傳統，在于美化腐朽的唯心主義而否定中國唯物主義的歷史地位以至存在條件；其次論證在中國哲學史中貫串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路綫的不可調和的鬥爭，而不是如“新理學”所說的“中國哲學精神”是幾個唯心主義的雜匯。另一方面，為了使人明了“新理學”

的欺騙方法，杜国庠同志对哲学史文献作出符合于实际的分析和批判，进而证明“新理学”歪曲事实，矛盾百出。杜国庠同志最后还指出了“新理学”的阶级根源及其反动实质：

第一，“新理学”的人类四种品类存在說，是封建統治阶级的等級命定观在自然界的虚构，其中所謂最高一級的圣人宜王說，这个王据說即“指社会的最高首領”。这就从神界下凡到俗界来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现实的政治統治的例外权了。杜国庠同志指責說：这样所謂“大公”的皇帝，历史上多的很，“未始不可流于容恶庇奸，而且实际上擅权窃国的大奸巨慝，未始不被其狐群狗党誉为‘圣明神武，首出庶物’的。……这种說法，势将助桀为虐，而誤天下蒼生！”从这里可以看出，由“新理学”披上神圣外衣的和杜国庠同志所刻划出原形的是同一个罪恶昭彰的独裁者。

第二，“新理学”把“担水砍柴”的貧苦劳动和“事父事君”的奴隶道德，都說成可以“經虛涉曠”，都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据說这样就可沒有对立而統一了，实质上这是一种安命于阶级压迫的奴隶哲学的玄虛形式。“过河拆桥”的中庸認識論一旦下降到人类实际生活中，便成了庸俗透頂的阶级調和論。杜国庠同志批駁这样的說教，认为它“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直接替压迫者維持其腐敗殘酷的統治，間接地阻碍了社会的革新”。

杜国庠同志的这种批判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他的明辨是非的精神在解放后得到了证实。

杜国庠同志对《中国思想通史》的編写計劃，和我相約必須不放松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論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在当时有因

難，但在內容上還必須是針鋒相對的。例如對實用主義者歪曲或誣蔑了的唯物主義者後期墨家、荀子、王充、范縝、顏元、戴震和章學誠等人，對有些唯心主義者所假借的莊子、公孫龍、向秀、郭象、華嚴、禪宗以及程、朱，對有些唯心主義者和復古主義者所曲解的周公、孔子以至王陽明等人，必須破除謬說，予以歷史主義的闡發。杜國庠同志計劃着重於墨家、公孫龍、荀子以及禪宗、王陽明等方面的研究，揭露反动理論的“走私”，這方面他做得很有成效，在一系列的文章或札記中都貫徹了這一計劃。例如《以天地理天地》、《不可破句讀書》、《太極原義不指本体》等短文都是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他在一九四三年寫的《論〈公孫龍子〉》一篇名文的結論就是有的放矢的批駁和痛斥，他說：“在研究中，也時常覺得公孫龍好像還活着，活在近人的新理學之中。公孫龍的‘指’世界，似就是新理學的實際——‘理世界’。……都不合乎真理。……〔二千餘年的〕時間又似乎對於某些人顯得格外無力。誰能說幾千年前的古物不會和當前的現實生活發生藤葛呢？也就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把研究的一點結果寫了出來。”

杜國庠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是有卓越成績的。他研究的範圍十分廣博，對古文獻的知識鑽研的也很深，他曾計劃要寫《中國邏輯史》、《中國佛學概論》等書，多次對我談過他計劃的腹稿。他在晚年所編輯起的論文集都是闡明中國哲學史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不是他所自謙稱名的“便橋”而已，而是具有啟發性的心得。

從《文集》的第一、第二、第三各部分，讀者可看到杜國庠同志對墨子、公孫龍、荀子以及清初學者有特別深刻的研究。這裡只舉幾個方面的突出的例子：他對公孫龍哲學思想規定為“多元

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一結論，我想是确乎难移的断案；他对公孙龙的“坚白离”和《墨經》的“坚白攬”的对立学說认为是战国时代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两条路綫斗争的重要方面，我想是卓越的发现；他对墨經在認識論和邏輯学上的珍貴遗产的詮解与評价，我想是功力很深的独创；他对荀子《成相篇》认为是文学上别創的风格以及其中有对其哲学思想总结的作用，我想論断是正确的；他对中国古代中世紀唯物主义者的一系列論断，我认为他为中国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編写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徑。至于他說的“批判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問題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始終是我們必須坚持的战斗任务”，在这方面他所做出的范例，我想是更为我們大家要虛心学习的。

杜国庠同志在近年和我两次晤面时，曾經和我討論过有从宗教方面进一步研究墨子思想的必要，最后一次会面，他讲了不少他在这方面的新发现，可惜沒有把著作写出来。他还对我嘱咐，如果再版《中国思想通史》时，切記补充写上宋代的楊万里，并对王安石思想的經驗論因素加以补充。他說南宋时代的楊万里在唯物主义陣营中是陈亮、叶适以外的一支別出学派。这一点，他在《便桥集》中已經有簡略的論述。我在新近編的《中国哲学簡史》一书中依据杜国庠同志的遺言，特写了一节《楊万里思想》。

《文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仅收集了三篇发表在《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章节，实际上杜国庠同志虽然执笔的初稿不多，但他对于全书的审查、修訂以及对于主要人物的評价工作，付出过巨大的精力。

总之，杜国庠同志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这

里所介绍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党的高龄科学家、革命活动家杜国庠同志忠于党的事业的优良品质将永为我们的楷模，他的科学研究成果无疑地将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基础。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序《杜国庠文集》	郭沫若 1
杜国庠文集序	侯外庐 7

第一部分

先秦諸子思想概要	3
論《公孙龙子》	83
荀子从宋尹黄老学派接受了什么?	134
論荀子的《成相篇》	158
附：朱师轍(少濱)先生答著者論《成相篇》很像 《凤阳花鼓詞》书	175
从荀子的《成相篇》看他的法术思想	184
荀子对諸子的批判	191
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	198
关于《墨辯》的若干考察	217
阴阳五行思想和易傳思想	244
杂家言之作始者呂不韋和《呂氏春秋》	257
略論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	266